

上古楚方言语音研究述评*

杨建忠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 浙江财经学院中文系

提要 对上古楚方言语音的研究,以“五四”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多为零散性记录且从属于《诗经》音的研究;后期呈现出考证性、系统性、独立性特点,此期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及成果方面均有创获,但仍有不少问题。

关键词 上古楚方言、语音、概述

本文所论上古楚方言,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楚方言。

对于上古楚方言语音的研究,自古及今从未停止过。大致以“五四”为界分前后两期。

1、“五四”前

这一时期对楚方言语音的研究,呈现出记录性、零散性及从属性的特点。先秦,人们就已经注意到楚夏言殊的现象,有关记录亦散见于典籍中。¹降及两汉,对楚方言语音进行研究的当首推扬雄与王逸。罗常培认为扬雄《方言》是以字标音的。²惜扬雄仅止于记录!(扬雄《方言》是我们研究汉语史的重要著作,我们不能以今律古甚至苛求古人,此处仅表示遗憾、可惜!)王逸《楚辞章句》对楚语颇多发明。³魏晋南北朝,对楚语的研究以郭璞《方言注》最为著名,但郭注未开创新的体系,亦未对其中某一方言区进行专门研究。隋代治《楚辞》者有释道騫《楚辞音》。⁴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可补王《注》之遗。黄伯思认为《楚辞》乃楚语楚声。上述材料均以记录为主,且比较零散。明代陈第提出著名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语音史观,⁵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二书。其《屈宋古音义》三卷,就《楚辞》入韵之字,明其古音读法,只考单字音读,未及古韵分部,至于《楚辞》是否反映方音特色及反映什么样的方音特色,则付之阙如。但陈氏的语音史观影响深远。清人张裕钊给予颇为中肯的评价:⁶

必明乎古音而后训诂明,训诂明而后六经之说可得而知。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益加于前时,然陈氏创始之功,顾不伟哉!

清代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韵》、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王念孙《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

* 非常感谢本刊匿名评审专家对拙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¹ 如在《左传·宣公四年》、《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均有记录。

² 罗常培《方言校笺·序》。

³ 据华学诚先生(2003:328-340)的研究,王逸《楚辞章句》中解释方言词同时又指明方言区域的共22条,其中2条是秦方言词,其他20条均属楚方言(名词9个,动词6个,形容词4个,语气词1个)。

⁴ 周祖谟先生(1981[1966]:168)认为道騫或为智騫之误。

⁵ 见《毛诗古音考·序》。

⁶ 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原文载《毛诗古音考》卷首。

江有诰《楚辞韵读》、《老子韵读》等对楚人作品特别是《老子》、《楚辞》等书中韵语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把它们作为证明《诗经》音系的辅助材料而从属于《诗经》的研究，对其地域性即方言的性质却未注意。

2、“五四”后

“五四”是中国现代音韵学的开端，这一时期的音韵学家运用新方法、新材料、新工具对上古音进行研究。从前期的记录性、零散性及从属性转向考证性、系统性及独立性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分为两派，一派以董同龢、罗常培、周祖谟、林莲仙、刘志成诸先生为代表，主张楚方言有自己独特的语音特色，认为《楚辞》、《老子》等楚人作品反映楚方言语音特色。肯定楚人作品的方言性质是此派一大特点。董同龢先生(1938)归纳出上古楚方音东阳通叶、之幽通叶、鱼侯通叶、真耕通叶四个特点。之后，罗常培、周祖谟等先生(1958)踵其武，以楚人作品中的有韵之文、汉人注疏及扬雄《方言》中所记载的楚方言为材料，与《诗经》音系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楚方言的语音特色，确定《淮南子》所代表的方音是陈楚江淮一带的音。林莲仙(1979)集中考察了《楚辞》的语音特点，李裕民曾考察了楚方言在语音及词汇方面的特点，刘志成(1991)在《楚方言考略》中考察了楚方言与北方语音在声、韵、调三方面的不同特点。还有一些学者则是利用扬雄《方言》归纳楚方言语音特色，如丁启阵(1991)、何耿镛(1984)、董达武(1992)；也有一些学者在利用《方言》对汉代方言区划进行考察时，论述或涉及到了楚方言语音，如林语堂(1994)、刘君惠等(1992)。大量运用楚地出土文献来研究楚方言语音是本派的又一特点。近年来出土楚文献增多，为楚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学界藉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影响较大且成系统者大陆有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1985)、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1994)、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2003)、杨建忠《秦汉楚方言韵部研究》(2004)，台湾有李存智《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1995)、杨素姿《先秦楚方言韵系研究》(1996)、曾昱夫《战国楚地简帛音韵研究》(2001)、李昭莹《扬雄《方言》同源词研究——以秦晋方言和楚方言为例》(1997)。下面分别介绍。

刘宝俊(1985)论文系1985年华中工学院研究生论文，尚未出版，仅有《秦汉帛书音系》概述(1986)一文发表。从概述来看，刘氏从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整理所得的1300余对通假异文为材料，采用李方桂《上古音研究》中的上古音和中古音体系作为历史发展中的前后两个支点，参考罗、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1975)等对两汉魏晋时代音韵研究的成果，来考察帛书音系与前后时代音系的联系和分合演变。最后得出帛书音系：声类45个(其中单辅音声母26个，复辅音声母19个)；韵类30个；调类有平、上、去、入4个。最后作者认为帛书音系是战国秦汉时代楚地的方言音系，它与秦陇、蜀汉、梁益地区的语音较为接近，而与齐鲁地区的语音相距较远。

李玉(1994)以《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木简》、《阜阳汉简》、《汉陵汉简》、《包山楚简》、《定县汉简》、《放马滩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子弹库楚帛书》为取材基础，对其中的马王堆、江陵、阜阳、银雀山、武威六个点的简帛文书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整理。最后整理出6800余对通假字，以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的古韵31部作为标音及考察秦汉时期语音分合、演变的基础，一一标出它们的中古及上古音韵地位。以中古音上推秦汉音韵，通过古韵探讨秦汉音韵，利用概率统计法并结合音理来考察秦汉时期声韵调的分合与演变。声母方面，论证了22个单辅音声母的大致格局，另有清鼻音⁷hm-、⁷hn-、清流音⁷hl-三类单辅音。复辅音声母有⁷mP-、⁷ŋk-、⁷Pl-、⁷ml-、⁷Kl-、⁷ST-、⁷Thl-七类。这个声母系统有这样一些特点：①匣母一分为二支持邵荣芬(1991)年观点，并把匣_甲归群，匣_乙归云；⁷②中古邪母在西汉早期就一分为三：邪_甲是与心母相对称的一独立的声母；邪_乙归定；邪_丙属⁷ST-类复辅音声母。③西汉早期⁷ml-复声母应当是楚方言的语音特征之一。韵

⁷ 李氏的匣_甲即邵荣芬先生(1991)的匣₁，匣_乙即邵荣芬先生的匣₂。

部方面,就“雅言”而论,李氏提出了三十一部说,歌、祭、月三分;鱼、侯分立;幽、宵分立;缉、叶分立;微、脂分立;真、文分立;先秦三十一部在秦汉时期从雅言音系的角度看,未发生质的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些音变现象,字的归部也有所变化。其韵部中涉及楚方言者有:①在语音方面古楚方言应该和蜀方言有较多的相同之处;②简帛文书中幽、宵“常常”通假当为方音之异,是楚方言及“蜀郡之音”的共同特征;③古韵侵部中的《广韵》东韵字在秦代、西汉早期的楚方言区及银雀山地区发生了 $\cdot m > \cdot \eta$ 音变;④中部与谈部“常常”通假可能是收 $\cdot m$ 韵尾的谈部字中有一些字发生了 $\cdot m > \cdot \eta$ 的音变,即谈部有少数字在西汉时期转入了中部,这可能是古楚方言特有的音变。⑤在楚方言区和武威地区的方言里,缉、叶两部关系密切;⑥缉、物通假是楚方言的音韵特征。⑦李氏假设西汉早期发生了 $\cdot p > \cdot t > \cdot l (> \cdot i \text{ 或 } \cdot o)$,这一音变是楚方言的特征之一;⑧微、脂两部发生“常常”通假是楚方言的特征;⑨西汉早期的楚方言中,真、文正处于合流过程中;⑩祭、月两部关系较为密切的材料主要见于古楚方言区和古齐鲁方言区;⑪月、质两部到秦汉时期关系更为密切,在楚方言里发生“常常”通假;⑫秦汉时期鱼、侯在楚方言音系里可能正趋于合流。声调方面,李氏认为从战国中期到东汉初期,平、上、去、入四声判然有别。这一观点与同时期传世文献的押韵情况基本相符。

从李氏所论的声韵调系统看,其在韵部方面涉及方言者众多,而在声母及声调方面则甚少论及,⁸虽然李氏“前言”指出:“本书宗旨在于利用简帛文书中的语言新资料探讨秦汉时期‘雅言’的语音系统和汉语语音发展史的一些规律。”但仍让笔者有所怀疑:为什么所用材料完全一致,在韵部方面能反映出那么多的方言特征,在声母及声调方面却所见甚少或根本没有?虽然如此,其结论仍“既可以弥补西汉时期声母研究方面的不足,也可以用来验证根据同时代传世文献材料研究韵部、声调所得的一些结论。”“简帛文书中的‘常常’通假现象相当复杂,其中有些现象为方音之异;这方面的分析对考察秦汉时期‘雅言’与方言的关系以及方言的分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玉 1994:2)总之,“由于材料比较丰富,统计分析比较详细,本书提示了很多有意义的现象,提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见解。”这部书“给我们提供了战国秦汉时期,尤其是秦汉时期汉语音韵系统的一个大致轮廓。这个轮廓可以作为今后对这一时期汉语音韵作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参考。”(李玉 1994:2)

赵彤(2003)利用《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二册)中谐声和假借,与传世的《楚辞》、宋玉赋和《庄子》的用韵相结合,对战国时期楚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了研究,并对声母和韵母的音值进行了构拟。⁹得出战国楚方言有26个声母,这个声母系统中的一套清鼻、流音声母: $\cdot m-$ 、 $\cdot n-$ 、 $\cdot \eta-$ 、 $\cdot l-$ 、 $\cdot r-$;早于《诗经》时代的汉语中有一套圆唇小舌音 $\cdot Qw-$,战国楚方言中这套圆唇小舌音在所有元音前都变成了舌根音 $\cdot K-$;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 $\cdot Kl-$ 在战国楚方言中失去后置辅音 l 而变为单辅音 $\cdot K-$ 。30个韵部(有六个主元音: e 、 u 、 o 、 y 、 ɔ 、 a ;有四个介音: $\cdot j-$ 、 $\cdot r-$ 、 $\cdot i-$ 、 $\cdot u-$,这四个介音可组成复合介音 $-ju-$ 、 $-iu-$ 、 $-rj-$ 、 $-ru-$ 、 $-rju-$)共计193个韵母。与《诗经》音系相比,战国楚方言中的韵母发生了一些变化:元音 $\cdot u$ 复化为 $\cdot au$,从而引起 $\cdot o$ 、 ɔ 、 a 的依次高化;元音 $\cdot y$ 在唇音韵尾 $\cdot p$ 、 $\cdot m$ 前变为 $\cdot o$;冬部 $\cdot om$ 的韵尾变为 $\cdot \eta$ 。韵部的变化有:除月部外各部的长入声转入相应的阴声韵部;部分脂部字转入微部;部分真部字转入文部。有平、上、去、长入、短入5个声调,除月部以外各部的长入字在战国楚方言中变成了去声。该文不但系统论证了战国楚方言音系,而且对一些有争议的字的归部也有详细论述,文后还附有《屈宋庄》韵谱(内含郭店楚简《老子》、《语丛四》韵谱)、《楚简声母谐声关系总表》,材料丰富,且方法得当,所以其结论大致可信,但其所构拟的六个主元音中竟有四个后元音而无央元音,试比较王力《汉语语音史》六元音: a 、 e 、 o 、 u 、 ɔ 、 ə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元音: i 、 u 、

⁸ 声母方面仅论及西汉早期 $\cdot ml-$ 复声母应当是楚方言的语音特征之一,与韵部相比相差悬殊。

⁹ 赵彤博士论文《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已于2006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名为《战国楚方言音系》,因本人尚未见到该书,故仍按其博士论文评述。

ə、a；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元音：a、e、o、u、i、i，我们发现赵氏所构拟的战国楚方言音系中无央元音，是比较怪的。

杨建忠(2004)系统整理了马王堆帛书中的借字与被借字、扬雄《方言》中的楚方言标音字，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与《诗经》音系、《淮南子》音系进行比较，运用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秦汉时期楚方言的韵部系统。得出秦汉之际的楚方言韵部仍为30部的结论。就韵部论，似与《诗经》音系区别不大，但这30部有如下特点：1. 阴声韵①未见之、幽接触用例，“侮”在《诗经》之前可能归之部，《诗经》之时已转入侯部，但在秦汉之际的楚方言中仍归之部；②歌、支关系密切是战国到秦汉之际楚方言的特色，但二部并未合并；③秦汉楚方言及蜀方言中之、鱼两部元音接近。幽、宵接触为秦汉时期楚方言的特色；④脂、微分立，秦汉时期楚方言中的“火”从《诗》中的微部转入了歌部；⑤阴声韵歌、支及与其相应的阳声韵元、耕表现出平行发展的态势。2. 阳声韵①与阴声韵鱼、侯相通非楚方言特色相对应，阳声韵东、阳合韵亦非楚方言特色，至少在《淮南子》以前如此；②在楚方言中，冬部本与侵、东部均有关系，不同于《诗经》的冬部并入侵部。直到《淮南子》《新语》中冬部才完全摆脱侵部而并入东部，走过一个逐渐远于侵部而近于东部直至并入东部的过程。③真、文关系密切且真部有向文部靠拢的倾向，可能已有部分真部字转入到文部，但二部终未合并；④从《诗》直到战国楚方言中，[-m][-n]关系松弛。在秦汉的银雀山汉简中也没有接触的用例，而在蜀方言和秦汉时期的楚方言中[-m][-n]的关系却比较密切。3. 入声韵①入声韵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可以说总体上没有什么变化；②与相应的阴声韵脂、微分立一致，质、物也是分立的。最后作者还对相关的论题作了展望，认为楚方言的研究大有可为。论文后还附有〈马王堆汉墓帛书借字与被借字表〉、〈《方言》中楚方言标音字对应表〉供读者或研究者参考使用。

台湾李存智(1995)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湖北江陵凤凰山汉简，以李方桂(1980)的系统为基础，先分析不同地区出土材料之音韵现象，然后再综合分析秦汉简牍帛书之声母、韵部、声调，并构拟音韵系统。

杨素姿(1996)论文先对楚方言区进行了划分，然后利用《楚辞》中屈宋作品、《老子》《庄子》及近世以来出土的楚文字材料，包括青铜器中的用韵铭文和简帛文字，与《广韵》比较，来对先秦楚方言的韵及调进行研究，并对韵系进行了构拟。

曾昱夫(2001)利用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墓》、《包山楚简》、商承祚《战国楚竹书汇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等材料中的分析出的393条异文与假借资料，根据李方桂、龚煌城、何大安等的拟音原则来归纳、构拟战国时期楚方言的语音系统。结论认为，战国楚地简帛反映出来的音韵系统，有31个单辅音声母，5类复辅音声母；22个韵类、4个介音；平、上、去、入4个声调。

李昭莹(1997)以扬雄《方言》为材料，利用共同语与方言词之间的音韵对应关系找出同源词，并以秦晋方言和楚方言为例，指出二者的共有特点及各自的不同特点。

有的学者还对简帛中的有韵之文进行了探讨。如陈广忠〈帛书《老子》的用韵问题〉(1985)、刘宝俊〈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用韵研究〉(1996)、〈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与上古楚方音〉(1990)，分析了帛书《老子》及佚书的韵例，编了韵谱，并归纳其语音特点。

另有单篇论文对楚方言语音的声韵调或楚地文献的通假字进行探讨、论及者尚有若干，如虞万里〈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2001)从方音角度论述了古韵歌、支的关系与演变，认为“击秦之时，周郑音系歌部音与支部音绝然分读，而楚地则将歌部音读为支部

音。西汉之际，歌支音读虽然大致如周秦，但楚地文人辈出和文化勃兴，为以后歌部中的一部分字流入支部创造了条件。到了东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歌部中的一部分字受到楚音的支配，流向支部，而这时反切的产生，也促进了这个音变的过程”。¹⁰该文材料详赡，论证严谨细密，结论较为可信。刘唯力〈从平江幕阜山方音看《楚辞》的楚音〉(1987)利用现代的平江幕阜山方音来探讨《楚辞》楚音。李玉〈秦汉之际楚方言中的 *ml- 复辅音声母〉(1991)论及秦汉时期楚方言中可能存在复辅音声母。范常喜〈郭店楚简《老子》中的假借字〉(2003)据荆门市博物馆编著的《郭店楚墓竹简》及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参照王力上古 30 韵部、唐作藩上古 32 纽，而考得 235 组假借字，并对其中确知其上古声韵调的 135 组进行了分类考察，因其写作目的是“以期能对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点材料”，¹¹故对假借字所反映的语音未予深究。赵振兴、陈灿〈《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2003)对《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其结论不但可以验证前人研究成果，而且还可弥补西汉时期声母研究的不足，对研究当时语音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因为作者写此文时上博简《周易》尚未公布，¹²故未能利用时代早于帛书、可信度的上博简《周易》，实是遗憾。¹³聂中庆、李定〈郭店楚简《老子》通假字研究〉(2005)共考得通假字 44 组，因文章着眼于对《汉语大字典》通假字的增补，故未对这 44 组通假字反映的语音状况进行研究，而且，判定通假字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语音的相同或相近，但作者所认为的这 44 组通假字中没有一组涉及到语音。¹⁴赵彤〈以母的上古来源及相关问题〉(2005)不同意目前学界所认为的以母上古是边音 *l- 的观点，据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认为以母跟和以母谐声的各种声母应该是复辅音，并结合谐声，提出“以母的上古音应该拟作 *ql-”的观点。赵彤〈中古舌根声母字和双唇声母字在战国楚系文献中的交替现象及其解释〉(2006)，利用上博简、郭店简等材料指出中古舌根声母字和双唇声母字在战国楚系文献中存在交替现象，是因为上古楚方言中发生了 *K^w->*P- 的音变，出现在后元音前的圆唇舌根音声母变成了双唇音声母。并推测楚方言中这种音变发生的年代大致在春秋中晚期，即公元前 7 世纪前期至公元前 5 世纪前期这段时间内。该文是利用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楚方音的最新成果。¹⁵

另外，对楚文献进行整理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对楚方言语音的研究，如朱季海《楚辞解故》(1963)与《庄子故言》(1987)、高明《帛书老子校注》(1996)、邓柏球《帛书周易校释》(1996)等。

另一派以郭沫若、喻遂生(1993, 1995)、罗江文(1999)、杨捷(1997)等先生为代表，通过对《楚辞》、《老子》等楚人典籍的用韵与《诗经》用韵、金文押韵的比较，以及《楚辞》中亦可见到别处方言等，认为《楚辞》、《老子》并不代表楚方言的语音特色，而是通语的特色，屈宋赋可能是按共同语的雅言创作的。如喻、罗即从两周金文用韵中提出反证。王力亦可归入这一派。王先生是在普通语言学、语音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指导下系统治《楚辞》音韵的当代学术大师。王先生作《楚辞韵读》，认为《诗经》时代古韵是二十九部，而以《楚辞》为代表的战国时代是三十部。但王先生并未考虑这一变化的地域因素，而径直以历时的语音变化来解释。因为他认为：“《楚辞》的韵分为三十部，比《诗经》的韵多出一个冬部。这是从侵部分化出来的。时代不同了，韵部也不尽相同了。”(王力 1986:453)

¹⁰ 虞万里《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音韵学研究》第三辑，又见《榆枋斋学术论集》。本文即引自此集。

¹¹ 见其论文摘要。

¹² 上博简《周易》公布于马承源主编(2003)第三册中。

¹³ 关于上博简《周易》与通行本及帛书本《周易》通假字的比较研究，笔者正在进行。

¹⁴ 文中有三组虽然引用了《集韵》、《广韵》，但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这两本韵书当作的《说文》一样的字书来用的。

¹⁵ 论及上古楚方音者尚有 W. South Cobin(1983)的 *Fangyan gleanings* (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只因笔者多方查找未果，故此处不便评论。

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王先生“虽然发现《楚辞》用韵的一些特点，但是也难以断定那是方言的特点，还是时代的特点”，因而最终在讲古音的时候，“很少讲到方言”（王力 1985:11）。

上述研究不仅利用了新材料，而且还与传世楚文献进行比较，互相证发，颇有新意。但仍有以下问题未解决：

第一，在上述论文中，有部分论文所用材料虽然广泛，但这些材料“所反映的语音现象在时代上较为接近，但在地域上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同一出土地点的材料所表现的语音现象当有一定的同一性，不同出土地点的材料所表现的语音现象应有一定的差异性。如果把这些不同出土地点的材料不加区别地放在一起使用，很可能会抹杀一些方言特征，影响研究的质量和效果。”（刘宝俊 1986）周祖谟指出：“研究古音，对所用材料的时代要加以区分，同时也要注意材料的地域性。”（周祖谟 2001:123）所以，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古音，一定要同时兼顾其时代与地域，即使同一地域，我们认为也要分批进行研究，这样可保证其内部的一致性及其结论的纯粹性与可靠性。同时，这样也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二，对楚地出土文献的充分利用与详尽分析仍然不够。上述论文对楚地出土文献的利用，基本上集中于马王堆帛书及上博简、郭店简等，而楚地出土文献并不仅限于此。如战国楚简就有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杨家湾楚简、长台关楚简等 20 余批，帛书亦有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等。

第三，出土楚文献与传世楚文献的结合研究仍较欠缺，对传世楚文献中有关语音的资料穷尽性梳理不够。上述研究中，有的仅研究出土文献，有的仅研究传世文献，即使有结合二者进行研究的，也仅是部分结合。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当大力运用并发扬。

第四，《楚辞》、《老子》等楚人作品到底是否反映楚方言特色？显然，反对者认为是通语或雅言。即使是赞同者，对二书特别是《楚辞》的韵式韵例也有很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直接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第五，因所采用的参照标准不同，所以结论的可比性较差。比如有些作者以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统为参照标准，而有些作者又以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统为参照标准，还有的是声母以王力先生系统，韵部则以周祖谟、罗常培先生的系统为参照标准，故造成结论难以趋同，而且有“暗箱操作”的可能。故有的学者在文末附有自己整理所得的材料供检验与参考。

最后，研究中未考虑楚方言与当时其他方言及今湘方言的关系。很明显，任何一个方言都不是孤立地、封闭地发展的。因为，方言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所以，对楚方言与当时各方言的关系应当充分考虑。外此，楚国有 800 年历史，楚方言是否也只有 800 年的历史？是不是也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了？它在今天的方言如湘语中有无遗存？这些问题都应当考虑，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上述论文中未有及此者。

较之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材料有着时代明确、地点集中、近古存真的诸多优点。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少关于古音的问题。朱德熙（1999:90）、周祖谟（2001:121-141）、裘锡圭（1992:156-168）等先生也分别谈到在古音研究中要重视并且要充分利用古文字材料，强调要把对古文字的研究与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在看到利用出土楚文献研究上古楚方言语音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注意材料的运用学远远不够。近年来地不爱宝，出土的楚文献地点之集中、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巨大，都为我们对楚方言的研究提供了富贵而且丰富的资料。对这些材料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以之来检验前人成果并不囿于成说而勇于提出新说，这样楚方言乃至学术才能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 陈广忠. 1985. 〈帛书《老子》的用韵问题〉，《复旦学报》1985.6。
邓球柏. 1996. 《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出版社。
丁启阵. 1991. 《秦汉方言》。上海：东方出版社。
董达武. 1992. 《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方言共同语初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董同龢. 1938. 〈与高本汉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音特色〉，《史语所集刊》7.4。

- 范常喜. 2003. 〈郭店楚简老子中的假借字〉,《菏泽师专学报》2003.1。
- 高明. 1996.《帛书老子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
- 何耿镭. 198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华学诚. 2003.《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 李存智. 1995.〈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方桂. 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守奎. 2003.〈出土楚文献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1。
- 李 玉. 1991.〈秦汉之际楚方言中的 *ml- 复辅音声母〉,《语言研究》1991(增刊)。
- 李 玉. 1994.《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 李裕民. 1986.〈楚方言初探〉,《山西大学学报》1986.2。
- 李昭莹. 1997.〈扬雄《方言》同源词研究——以秦晋方言和楚方言为例〉,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林莲仙. 1979.《楚辞音均》。香港: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 林语堂. 1994.〈前汉方音区域考〉,《林语堂全集》(卷十九)。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刘宝俊. 1985.〈秦汉帛书音系〉,华中工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
- 刘宝俊. 1986.《〈秦汉帛书音系〉概述》,《华中民族学学报》1986.1。
- 刘宝俊. 1990.〈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与上古楚方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5。
- 刘宝俊. 1996.〈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用韵研究〉,《语言研究》1996(增刊)。
- 刘君惠等. 1992.《扬雄方言研究》。成都: 巴蜀书社。
- 刘唯力. 1987.〈从平江幕阜山方音看《楚辞》的楚音〉,《云梦学刊》1987.3。
- 刘志成. 1991.〈楚方言考略〉,《语言研究》1991(增刊)。
- 罗常培、周祖谟. 1958.《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
- 罗江文. 1999.〈谈两周金文合韵的性质: 兼及上古楚音〉,《楚雄师专学报》1999.4。
- 马承源主编. 200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聂中庆、李定. 2005.〈郭店楚简《老子》通假字研究〉,《语言研究》2005.2。
- 裘锡圭. 1992.〈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古代文史研究探索》,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邵荣芬. 1991.〈匣母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1991.1。
- 王 力. 1985.《汉语语音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 力. 1986.《楚辞韵读》,《王力文集》(第六卷)。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谢荣娥. 2005.〈上古楚语研究述评〉,《长江大学学报》2005.4。
- 杨建忠. 2004.〈秦汉楚方言韵部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杨 捷. 1993.《〈楚辞〉楚语楚声说质疑》,《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3。
- 杨素姿. 1996.〈先秦楚方言韵系研究〉,台湾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 喻遂生. 1993.〈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2。
- 喻遂生. 1995.《〈老子〉用韵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1。
- 虞万里. 2001.〈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 曾昱夫. 2001.〈战国楚地简帛音韵研究〉,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 彤. 2003.〈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赵 彤. 2005.〈以母的上古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05.4。
- 赵 彤. 2006.〈中古舌根声母字和双唇声母字在战国楚系文献中的交替现象及其解释〉,《中国语文》2006.2。
- 赵振兴、陈灿. 2003.《〈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古汉语研究》2003.3。
- 周祖谟. 1966.〈骞公楚辞音之协韵说与楚音〉,《问学集》(上),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版。
- 周祖谟. 2001.〈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和古音的考订〉,《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99.〈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季海. 1963.《楚辞解故》。北京: 中华书局。
- 朱季海. 1987.《庄子故言》。北京: 中华书局。
- Ting, Pang-Hsin(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Ancient Chu phonology

Jianzhong YA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u* dialect's study can roughly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In the former stage, related studies always correlated with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Shijing*. In the latter period, thank to new methodology as well as textual evidence (the loan character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have come to know by more peop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Chu* phonology have shown a great advance. There are, however, still problems yet to be solved.

Key words Ancient Chu dialect, phonology, review